

# 清华国学的辉煌与复兴

○ 学生记者 赵岗



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  
(1925年)  
前排自左至右：李济 王国维 梁启超 赵元任  
后排自左至右：章昭煌 赵万里 梁廷灿

2009年11月1日，备受关注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。回望1925年，清华国学研究院群英荟萃，既有令人称道的“四大导师”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挥鞭执教，亦有数十位日后享誉中国学术界的俊杰毓秀求学问道。尽管这场千载难逢的风云际会持续了四年就风吹云散，却造就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“神话”，而今承载着21世纪新希望的新国学院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未来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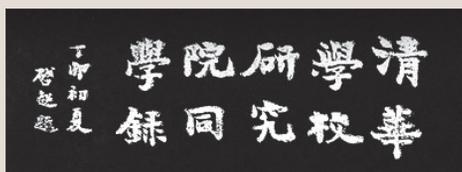
## 风云际会

1925年2月12日，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将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聘书交给吴宓，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也于当日成立。第二天，吴宓就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，到位于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的王国维住处，商聘大师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。同时，吴宓于2月22日赴天津拜谒梁启超。王国维、梁启超应聘后，吴宓随即与他们商讨草拟“研究院缘起与章程”，并准备招生事宜。与此同时，吴宓建议聘请陈寅恪担任国学院导师，后经多次积极推荐得到校方同意，发出聘任信函。3月6日，在曹云祥主持下的清华学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吴宓、王国维等人草拟的《研究院章程》，为国学研究院建立了“照章办事”的准绳。此间，经教务长张彭春积极推荐，校长曹云祥电聘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。6月18日，吴宓受命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。8月1日，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正式成立，亦通称国学研究院。

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产物。新文化运动以来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对传统文化近乎全盘否定，而对西方文化高唱赞歌，这种文化上的过激态度让人们觉得中国文化一无是处，挫伤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，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。1919年12月，北大教授胡适发表文章《新思潮的意义》，将新思潮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：研究问题、输入学理、整理国故、再造文明，而最关键的是“输入学理”和“整理国故”。

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输入学理，1919年之后，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，开始转向于整理国故。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碰撞，很多人逐渐认识到，在文化领域，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，没有创新就无所谓发展；越是向西方学习就越要重视本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继承；中西文化应当同等对待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。1922年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，其后东南大学国学院、清华国学研究院、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、还有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相继成立。

1917年，蔡元培在清华高等科演说，就提醒即将留学的清华学子：“吾国学生游于他国者，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，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。”所谓“特性”其实就是指民族文化传统。他希望“后之留学者，必须以‘我’食而化之，而毋为彼所同化。学业修毕，更遍游数邦，以尽吸收优点，且发达我特性也。”梁启超在对1924年甲子级清华毕业生演说时也说：“不论什么国家，什么民族，他总有他自



梁启超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题字

己的精神。假如要丢掉本国民族的性格换取外国的精神，结果只是把本国性格的好处丧失尽了，外国精神的好处还是得不着”。

可以说，20世纪20年代初，在中国重新认识传统文化、主张中西融合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。清华师生也在积极努力中。1924年5月，美国政府批准第二次退还庚款六百多万，专作教育及文化基金之用，清华为了竞争这批庚款，加速了改办大学和研究院的进程。校长曹云祥撰写的《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》，公开清华发展的三大计划：改设大学、筹备大学基金、拟设研究院。他指出，近代中国大量输入西方文化，却忽视了文化的融合和承受，原因是缺少专门的研究机构。要融会东西，须先彻底了解中国固有文化。欲了解中国古文文化，则必设立高深学术研究机构不可。于是在未能普遍设立各种研究机构之前，先设立了国学“研究院”，因为国学对经费、师资的要求相对较低，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较容易开设。

在时代的浪潮和清华师生的推动下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千呼万唤始出来，而它也成为这场风云际会的焦点。

### 神话诞生

清华国学院汇集众多名师，其阵容在当时无与伦比。不仅如此，仅存在四年的国学院，总共不过招收了70多个学生，其中却有40多人成了知名学者，如王力、姜亮夫、陆侃如、高亨、谢国桢、徐中舒、姚名达、刘盼遂等，其成材率之高，令人惊讶。这个神话般的传奇是如何诞生的呢？

叶企孙曾和人说起老清华办学成功的经验，认为主要是两点，一是经费充裕，二是慎选师资、宁缺毋滥。这也揭示出了清华国学院成功的一些原因。当时的清华学校，其经费之充裕是国内其他高校远难企及的。学生一旦录取，只要愿意长期住校，潜心研究，笃志学问，学校就发给奖学金。国学院还给予优秀毕业生奖学金，如1926年的第一届国学院毕业生29人，成绩优良者16人皆给予每人100元的奖励。导师还带着学生游北海，在北海静斋坐下来，面对湖光

山色，畅谈学问。国学院还设立专门的购书委员会，积极添购图书。以上这一切，没有充裕的经费支持是很难办到的。

经费充裕固然重要，但国学院的辉煌更主要是由名师带来的。彼时国学大师王国维、梁启超尚在，学贯中西的大家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学成归来，他们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，也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西方文化，以世界学术之眼光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，努力达到中西融合。当年国学院招聘导师时，有四个标准：第一，必须对中国文化的全部知识有所了解；第二，必须掌握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；第三，必须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学的成果；第四，愿意和学员亲近、接触，热心指导，以便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以及正确的治学方法。

王国维的国学功底自不必说，他早年更是完全潜心于西学，曾系统研读德国古典哲学，翻译了不少外文著作，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比较文学的开山之人。陈寅恪曾总结王国维的治学方法为三种对比关系：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；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；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。早在20世纪初，王国维就针对洋学派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之说，提出“学无中西”，指出：“何以言学无中西也？世界学问，不出科学、史学、文学，故中国之学，西国类皆有之；西国之学，我国亦类皆有之。所异者，广狭疏密耳。”又说：“余谓中西二学，盛则俱盛，衰则俱衰，风气既开，互相推助。且居今日之世，讲今之学，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，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。……治《毛诗》、《尔雅》者，不能不通天文、博物诸学；而治博物学者，苟质以诗赋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，则于此学固未为善。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，证梁虞翻、唐行一之说，以明《竹书纪年》之非伪，由《大唐西域记》以发见释迦之支墓，斯为得矣”。并强调：“异日发明广大我国之学术者，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，而不在一孔之陋儒，固可决也”。

陈寅恪也有相似的观点。他在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中说：“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，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，其结局当亦等于玄装唯识之学，在我国思想史上，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，且亦终归于歇绝者。其真能



曹云祥

于思想上自成系统，有所创获者，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一方面不忘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实相成之态度，乃道家之真精神，新儒家之旧途径，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”而陈先生一生信守的学术自由之观念，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，另一方面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密不可分。

梁启超在中学方面是通人，西学方面也卓有成就，清末民初他积极办报刊写文章，向国人传播西方知识。赵元任、李济，于中国文化深有造诣，赵元任将国外新的语言学与中国传统小学融合研究，李济则用西方先进考古学发掘、研究中国地下文物。这五位大师无论是学识还是眼光都是一流的，他们希望通过对国学的教学和研究，在“西化”之风日盛的情况下，重建中国的本位文化，而这种重建，不是固步自封，不是沉迷故纸堆，而是通过交流、融合而博采中西文化之长，熔铸新的中国文化。

清华国学院短短的四年里人才辈出，不仅是要有名师，还要有“高徒”。清华国学院草创之时，传统文化虽然已遭到近代思想启蒙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创，但其文脉尚在，尚有大批读书人熟谙经典，有志于中国传统学问；而且，当时的社会风习还服膺经典传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国学院的创办就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，竖起大旗，加上有名师坐镇，很快就有各方俊秀前来求师。国学院入学考试十分严格，经慎重挑选方可接纳。当时研究院生源质量很高，应届大学毕业生不足一半，以教育界及学有根底者居多，不少人在入学前已有著作问世，已是相当成熟的青年学者，他们带艺求师，能够很快进入状态，加以名师点拨，迅速脱颖而出。

清华国学院取得巨大的成功，还与其独特的教育体制密不可分。当时西方式的教育体制已经广泛引进中国大学，但清华国学院却更像是中国传统的书院式教学。其章程称：“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。研究之法，注重个人自修，教授专任指导，其分组不以学科，而以教授个人为主，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，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，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，均能确有所获。”国学院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分科教学方法，不分文史哲，而以导师来分组教学。师生关系十分密切，与旧式书院类似。

国学院当时择师时曾要求导师愿意和学员亲近、接触，热心指导，以便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以及正确的治学方法，而各位导师也正是这样做的。国学院每月一次的师生茶话会，交流师生情谊，心得学问。即便这样，梁启超还是不太满意，抱怨说除了上课，没有更多时间与学员接触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学生对老师高山仰止，老师对学生倾囊相授，共同涵泳中国文化，这正是昔日书院教育之不可或缺的部分。这种近乎中国传统的传授方式，对国学教育而言似乎更为适合。

清华国学院学制一年，但不设学位，由学生自由选择导师和研究方向，这就可以使学生专注于学问研究，而不以追求学位为目标。四位专任教授中，仅赵元任一人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，王、梁、陈三位虽是学贯中西、博大精深的学者，均无博士、硕士头衔，甚至连学士都不曾是。1925年4月，梁启超应聘到职后，向曹云祥建议聘请陈寅恪。曹云祥问：“他是哪国博士？”梁答：“他不是博士，也不是学士！”曹又问：“他有什么著作？”梁说：“也没有著作！”曹说：“既不是博士，又没有著作，这就难办了。”梁启超生气说：“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，著作算是等身了，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。”国学院这种不重学历、只看实才的做法延请到了许多名师；不授学位，学生也潜心志于学，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
此外，清华国学院导师“常川住院”，学生不预外务，长住学校，都有利于师生深入交流，潜心研究。国学院成立时，决定“暂不刊发杂志。”认为：“（1）杂志按期出版，内容材料难得精粹。若以照片祝词等充塞敷衍，与本院声名有损无益；（2）学生研究期限，暂定一年，

研究时间已苦无多，若在分心于杂志之著述及编辑，必荒学业；（3）佳作可刊于丛书，短篇可于《周刊》、《学报》中分别刊登。”这些制度上的创新都推动了国学院取得丰硕的成果。

### 流星陨落

清华国学院成立半年，运作顺利，吴宓等人对此很满意，议定进一步扩大发展的设想。但校内一些老师对设立国学院一直都不以为然。

1926年1月5日研究院扩大的计划提出以后，受到了教务长张彭春反对。其实张彭春等人主张研究院应办成与大学衔接的多学科研究院，而吴宓则想办成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国学研究院。讨论结果否决了吴宓的计划，通过了张彭春等人的提议：“此后研究院应改变性质，明定宗旨，缩小范围，只作高深之专题研究，而不教授普通国学，教授概不添聘，学生甄取要从严，可用津贴之法，冀得合格之专门研究生。”对此决议，吴宓当即表示反对，梁启超也表示反对，赵元任、李济则表示赞同，王国维不置可否。

此后，此决议经过复议，略有改动，王、梁、赵、李（时陈寅恪尚未到职）都表示同意，但关于研究院未来之决议“俟大学研究院成立之日，现研究院即归并其中”，吴宓表示坚决反对，并坚辞研究院主任，尔后职务由校长曹云祥“兼理”。张彭春因工作关系，引起校长及同事不满而辞职，梅贻琦接任清华学校教务长，主持国学研究院院务，这场变动才暂时结束。这次决议明确了国学研究院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机构，其撤销只是时间问题了。

1926年6月2日，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，清华国学院痛失名师。此前，梁启超因病住院，因误诊割去右肾，体质大降。国学院遂由盛转衰。1929年6月21日，清华举行毕业典礼，校长罗家伦致辞中说：“研究院的同学，这也算是最后的一班……下年本校将正式创办各研究院。”

1929年7月，清华国学研究院送走应届毕业生，也走完了它四年的艰辛历程。陈寅恪改任清华大学中文、历史两系合聘教授，赵元任被中央

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，其他教职员也都担起了新的工作。

此后，清华国学院的融汇中西，贯通古今的精神由文学院继承，陈寅恪、朱自清、闻一多、王力、冯友兰、吴晗等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文学院教书育人，培养了众多著名学者和大师，还有许多政治家、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，如曹禺、钱钟书、季羨林、夏鼐、李健吾等。1952年院系调整，清华大学文学院并入北京大学，清华大学撤销文学院建制。

### 涅槃重生

20世纪80年代后，清华文科进入重建阶段，清华人文学科迅速恢复，学术实力提升也相当快。这都为国学院的复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
清华国学院的复建与近年来越发受人关注的“国学热”密不可分。近3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，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，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，也有了更多的经济条件和时间保证去关注文化生活，从而极大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，发掘、研究传统文化成为满足社会需要的重要方面。随着中国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强，我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文化，学界与媒体联手，更加促进了国学热的勃兴。

国学已不再是从前的阳春白雪，已经从精英走向了大众。民间国学热中，许多地方都从娃娃抓起，诵读经典。《百家讲坛》风起云涌，面向民间，以白话方式重新解读经典，唤起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。国学读物成为出版业新秀，尤其是白话经典更成为畅销之作。企业界很多人为了提高品位，纷纷报名参加国学班，也使许多大学面向社会的国学讲堂爆满。国学之热，已遍及天下。

但是，国学的普及也带来了国学的歪曲和讹误。国学的市场化，为迎合听众、读者的口味，存在被随意歪曲、任意解释的弊端。这就需要有严肃的指导。一些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，一方面是国学热时代大环境的推动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国学，以正确的态度去审视国学。人大、



王国维遗墨



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（左）和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共同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揭牌



李岚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题词

北大、武大等高校都已先于清华成立了国学院，清华作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国学成就的高校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有责任为当代国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经过长时间的准备，2009年11月1日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，并请来了四位皆能独当一面的名师：陈来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，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；刘东教授主要研究美学、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；刘迎胜、姚大力教授均以元史研究见长，是中国元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。

在当今文史哲分科的教育体制下，新国学院与老国学院不同，清华大学国学院不以教学为主，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，但会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以开展研究为主，更像是一个平台，一个国学文化交流和研究的平台。具体的计划可以概括为：“三个讲座”、“两个杂志”、“四个丛书”。

昔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是在当时独特的社会环境下，集天时地利人和而促成的一场千古盛会，虽为时短暂却光芒四射。今日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乃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成立的，没有当日国学院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，然今日之国学研究院于新的环境中亦有昔日无法企及的条件。今日世界文化交流远胜于昔，研究方法亦远多，已有之成果更是层出不穷，且更有和平安定之社会、欣欣向荣之经济支持，今日之国学研究院亦将走出自己的一条新路。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碑铭赞其具有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这亦是老国学院的精神象征，今日之国学院当承此精神，成就独具特色的辉煌，续写傲视寰宇的篇章。

### 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概览

**成立时间** 2009年11月1日。

**题词** 李岚清为国学研究院亲笔题词：“为研究弘扬国学精华做贡献”。

**院训** “宽正、沉潜、广大、高明”，由著名国学大师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专门题写。

**导师** 陈来教授：主要研究中国哲学，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；  
刘东教授：主要研究美学、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；  
刘迎胜、姚大力教授：均以元史研究见长，是中国元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。

**目标**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校属、跨院系的研究机构，将秉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，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，力求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，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。

**理念**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，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，也将以“中国主体、世界眼光”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。

**研究工作** 一：一份《国学文摘》。  
二：两本杂志，刘东主编的《中国学术》，还有刘迎胜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编的《中国元史》。  
三：三大讲座：陈来主持的“梁启超讲座”，刘东主持的“王国维讲座”，刘迎胜和姚大力共同主持的“陈寅恪讲座”。  
四：四套丛书：《清华国学讲演丛书》，《清华国学文存》，《清华国学论丛》，《清华国学译丛》。  
五：设立五个研究室，这跟老国学院的编制一脉相承。